

馬克思
哲學的貧困

第一分册

人民出版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
哲學的貧困

答蒲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学”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К. МАРКС
НИЩЕТА ФИЛОСОФИИ

本书正文“哲学的貧困”和附录“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及书末“注释”，譯文均采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卷。恩格斯写的“序言”和“第二版序言”，系据德文版新譯出的，譯者徐堅。附录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摘录），譯文采自我社 1959 年版徐堅譯本；“論蒲魯東”和“致巴·瓦·安年科夫”，譯文分別采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和第二卷。

馬 克 思
哲 學 的 貧 困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16}$ · 印张 $15\frac{1}{4}$ · 字数 131,000

196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64 年 10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615 定价（三册共）（五）1.85 元

目 录

恩格斯	德文版序言	1
恩格斯	德文第二版序言	20
馬克思	哲学的貧困 答蒲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学”	21
	序言	23
	第一章 科学的发现	25
	第一节 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的对立	25
	第二节 构成价值或綜合价值	38
	第三节 价值比例规律的应用	77
	甲、貨币	77
	乙、劳动的剩余	88
	第二章 政治經濟学的形而上学	102
	第一节 方法	102
	第一个說明	103
	第二个說明	109
	第三个說明	110
	第四个說明	111
	第五个說明	113
	第六个說明	116
	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說明	121

第二节	分工和机器	128
第三节	競爭和壟斷	145
第四节	土地所有权或地租	157
第五节	罢工和工人同盟	170

附 录

馬克思	致巴·瓦·安年科夫	183
馬克思	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	200
馬克思	政治經濟学批判(摘录) 柏林,1859年	219
馬克思	論蒲魯東 (給施韦泽尔的信)	223
	注释	234

德文版序言

面前这本书，是 1846 年底到 1847 年初那个冬天产生的，那时候，马克思对他的新的历史观点和經濟观点的基本特点，自己已經彻底了解了。刚刚出版的蒲魯东“經濟矛盾的体系或貧困的哲学”一书，給予他把这些基本特点同这个人的见解对立起来加以發揮的机会，从那时起这个人在当代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間就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自从他們两人在巴黎常常为經濟問題作終夜談以来，他們的路是越离越远了；蒲魯东的著作証明兩人之間现在已經橫着一条无法架渡的深沟；置諸不理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所以，马克思就在他的这一个答复里确认了这个不可救治的裂口。

马克思对蒲魯东的总評价，可以在附在这篇序文后面的那篇文章里^①看到，那是 1865 年在柏林“社会民主主义者”第十六、十七、十八期上发表的。这是马克思为那个刊物写的唯一的一篇文章；不久，施韦泽尔先生要使那个刊物轉上封建的、政府的軌道的企图暴露了，这就迫

^① 指马克思 1865 年 1 月 24 日給施韦泽尔的信，见本书第 223—233 頁。——譯者注

着我們在几星期后就公开声明不再投稿。

对于德国，面前这本书恰恰在现在这个时刻具有馬克思本人从未料到的意义。他怎么能知道，当他痛击蒲魯东的时候，刚好命中了他当时連姓名都不知的今日之野心神洛貝爾图呢？

这里不是深究馬克思同洛貝爾图的关系的地方；这件事，我不久就会有机会来作^①。这里只想指出，当洛貝爾图控告馬克思“剽窃”他、“在‘資本論’中大量地利用了”他的“認識”一书“而沒有提到”他的时候，他是在肆意誹謗。这种誹謗要找解释，只能是这位无人賞識的才子的悒悒寡欢和他对普魯士以外发生的事情、特別是对社会主义和經濟学文献的非常无知。馬克思既沒有看到这个控告，也沒有看到上述洛貝爾图的著作；关于洛貝爾图，他所知道的，根本只有那三封“社会书簡”，連这些也決不是在 1858 或 1859 年以前就知道的。

洛貝爾图有更多的理由认为，在这些信里，他早在蒲魯东之前就已經把“蒲魯东的构成价值”发现了；在这里，他当然又錯誤地自作多情，把自己看成是第一个发现者。不管怎样，他在我們这本书里也就連带受到了批判，而这就使我必須簡單研究一下他的“关于我国国家經濟状况的認識”这本“創業的”小书(1842)，只要这本小书除了

① 几个月以后，在 1885 年 5 月 5 日，恩格斯写完了他給“資本論”第二卷的序，讲了馬克思同洛貝爾图的关系。——譯者注

(又是不自觉地)包含着威特灵式的共产主义之外还預先披露了蒲魯东的见解。

现代社会主义，不論哪一派，只要是从資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出发的，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同李嘉图的价值理論联系着。李嘉图在 1817 年他的“原理”^①中，一开头就提出两条原理：第一，任何商品的价值单独决定于生产这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第二，全部社会劳动的产品分配于土地所有者(地租)、资本家(利潤)、工人(工資)这三个阶级之間。在英国，自从 1821 年以来，已經从这两条原理中作出了社会主义的結論，并且一部分提得这样尖銳和这样果断，使得那些现在几乎无人記得、大部分靠馬克思才再度发现的文献，在“資本論”出世以前，一直是不可超越的东西。这些情况改次再談罢。所以，如果說洛貝爾圖在 1842 年曾从上述原理引出了社会主义的結論，这对于一个德国人來說在当时肯定是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但是，至多只能在德国才算一个新的发现。蒲魯东有过类似的妄想，馬克思在批判蒲魯东时已經証明，李嘉图理論的这种用法毫不新奇。

“只要对英国政治經濟学的发展有一点点了解，就不会不知道，这个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候几乎都提倡过**平均主义地**（即社会主义地）^②应用李嘉图

① 指“政治經濟学和租稅原理”。——編者注

② 括号里的話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的理論。我們可以給蒲魯东先生指出如下一些著作：霍吉斯金的‘政治經濟學’(1827年版)，威廉·湯普遜的‘為人類謀取最大福祉的財富分配原則’(1824年版)，托·婁·艾德門茲的‘實踐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經濟學’(1828年版)等等，這一類的著作的名稱還可以寫上四頁。現在我們且來听听一位英國共產主義者布雷先生是怎麼說的。這裡引用他的出色的著作‘勞動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1839年里子版)中最重要的幾段話”。^①單單這裡從布雷的著作中引出的幾段話就把洛貝爾圖要求的優先權取消了一大塊。

那時候，馬克思還沒有去過不列顛博物館的閱覽室。他除了巴黎和布魯塞爾圖書館的書籍，除了我的書籍和札記以外，當我們一起在1845年夏天到英國作了六星期的旅行的時候，只瀏覽了曼徹斯特可以找到的書。這樣看來，上述的書籍，在那四十年代並不像現在這樣難於找到。如果說，儘管這樣，洛貝爾圖始終不知道有這些書籍，那完全要怪他的普魯士的地方局限性。他是普魯士所特有的社會主義的真正的奠基人，而現在也終於被公認為这样的人了。

但是，就在他可愛的普魯士，洛貝爾圖也不能一點不受驚動啊。在1859年，柏林出版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其中，從經濟學家對李嘉圖提出的種種

① 見本書第65—66頁。——譯者注

責難中舉出下述一點作為第二個辯駁，在第 40 頁上^①：

“如果一個生產物的交換價值等於包含在它裏面的勞動時間，一個勞動日的交換價值就等於它的生產物。或者說勞動的工資必須等於勞動的生產物。實際情形恰恰相反”。馬克思對此作了如下的注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李嘉圖的這種責難，後來給社會主義者抓住了。他們假定這個公式在理論上是對的，責備不符理論的實際，要求資本主義社會在實際上實現從它的理論原則推出的臆想中的結論。至少英國的社會主義者曾經這樣地將李嘉圖的交換價值公式轉而反對政治經濟學。”^②在同一個注里提到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這本書當時在書店裡到處都可以找到。

因此，洛貝爾圖有充分機會親自確定一下他的 1842 年的發現究竟是不是新的。他不這樣作，反而一再宣告他的新發現，把它看成如此舉世無雙，以致再也不想想，馬克思也能像他洛貝爾圖一樣，獨立地從李嘉圖的理論中引出自己的結論。決不會！馬克思“剽竊”了他，——然而就是這個馬克思向他提供過一切機會，讓他確切認識到，這些結論，早在他們兩人之前很久，至少在洛貝爾圖還保存的那樣粗糙形式上，在英國已經有人說到過！

李嘉圖理論的最簡單的社會主義的應用就是上面所

① 見“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0 頁。——譯者注

② 見同上第 178 頁。——譯者注

說的那样。这样的应用在許多場合會引向对于剩余价值的源泉和本质的認識，大大超过了李嘉图；就中洛貝爾圖也是如此。他在这方面，除了別人早已說过，并且說得至少是同样好的以外，什么也沒有提供，这且不說，他的表现方法还犯了同他的前輩一样的毛病，——他把劳动、資本、价值等等范畴，就在经济学家們传授給他的那种粗糙的、只看表面现象的形式上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而不考究它們的內容。这么一来，他就不仅切断了自己进一步发展的一切道路，——同馬克思相反，馬克思是第一个从六十四年来被反复背誦的这几条原理作出了一些东西的人，——而且为自己开辟了通向烏托邦的大道，这一点我們就会看到。

李嘉图理論的上述应用，——說全部社会产品、**工人的**产品属于作为唯一生产者的工人，——直接引导到共产主义。但是，正如馬克思在上述的地方也指出的那样，就經濟形式說，这种应用是錯誤的，因为它不过是将道义运用于經濟而已。照资产阶级經濟学的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不**属于生产了这些产品的工人。如果我們說：这是不公平的，不應該这样，但是这句話同經濟原来毫无关系。我們不过是說，这些經濟事实同我們的道德感情不合而已。所以馬克思从来没有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放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是放在必然的、在我們眼前一天比一天成熟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上；他只說剩余价值是

由无偿劳动构成的，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是，就經濟形式說是錯誤的东西，在世界历史意义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如果群众的道德感宣布某一經濟事实为不公平，如当年对于奴隶制或农奴制那样，这就証明这个事实本身已經过时，而另一些經濟事实已經出现了，由于这种情况，那原来的事實已經变成不能忍受和不能維持的了。因此，在表面的經濟不公平之后，可以藏着一个非常实在的經濟內容。不过这里不是詳細研究剩余价值理論的意义和历史的地方。

除此以外，人們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論还可以并且已經引出別的結論。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决定的。但是，情况是这样，在这个不良的世界上，商品一时在价值以上、一时在价值以下出售，并且这还不只是由于競爭引起的摆动。利潤率恰恰具有一个显著的对所有資本家保持同一水平的平均化趋势，正如商品价格具有因供需关系把自己归結到劳动价值的趋势一样。但是，利潤率是按照投在一个工业企业中的總資本計算的。由于在两个不同的生产部門中，一年的产品可以体现同量劳动，因而代表同等价值，两部門的工資又是同样高，但是一个生产部門的垫支資本可以并且常常是两倍或三倍于另一个生产部門，这里，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就同利潤率均等的规律矛盾了，这是李嘉图自己已經发现了的。如果两个生产部門的产品各按它們的价值出售，利潤率就

不能均等，如果利潤率均等，两个生产部門的产品就不能都按它們的价值出售。所以我們在这里遇到一个矛盾，遇到了两个經濟规律的二律背反；这个矛盾的实际解决，照李嘉图的說法（第一章第四、五节）一般是有利於利潤率而不利於价值。

李嘉图的价值理論，尽管有它的不祥之兆，但是也有它使善良的資产者喜爱珍貴的一面。它以不可抗拒的威力訴諸他們的公平感。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紀資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們的社会建筑物的基石。馬克思已經指出过，商品价值的决定于劳动、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間进行的劳动产品的自由交換，是现代資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識形态所据以建立起来的现实基础。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个认识一經确立，善良的資产者必然会因世道邪恶感到良心深受伤害，这个世界，名义上承认公平原則，事实上时时刻刻肆无忌憚地抛弃公平原則。特別是小資产者，他們的誠实劳动——尽管只是他的伙計和学徒的劳动——在大生产和机器的竞争下天天跌价，特別是小生产者，必然会迫切希望一个这样的社会，其中按劳动价值交換产品終于成为毫无例外的完全真理，換句話說，他們必然迫切希望一个这样的社会，其中商品生产的唯一一条规律絕對地不折不扣地通行，而把这条规律定要在其

下才能生效的那些条件、即商品生产以至资本主义生产的其他规律都排除了。

这种空想在现代(现实的或精神的)小资产者的思想中是多么根深蒂固，由下述事实就可証明：这种空想在1831年已經由約翰·格雷系統地發揮过，在三十年代，在英國還实际上試办、并在理論上推广过，1842年洛貝爾圖在德国，1846年蒲魯东在法国，都把它宣布为最新真理；1871年洛貝爾圖再次把它宣称为社会問題的解答，并当作他的社会遺囑；1884年，它又在一群追逐名位的人中找到了信徒，这些人以信奉洛貝爾圖为名，准备借普魯士国家社会主义謀自己的好处。

这种空想，馬克思已經把它批判得如此透彻，不論对蒲魯东也好，对格雷也好(參看本书附录^①)，因此，我在这里可以只限于对这种空想的論証和描繪在洛貝爾圖手上所特有的形式发表几点意见。

上面說过，洛貝爾圖把經濟学概念的传统的定义完全按照经济学家所传給他的形式接受了下來。他絲毫沒有想一想必須加以研究。在他看来，价值是“一物对他物按数量的声价，而这声价被看作尺度”。这个——忠厚些說——非常模糊的定义，至多告訴我們价值大致像什么，却決沒有說出它是什么。可是，这就是洛貝爾圖关于价值所能向我們說的一切了，因此，他显然是在寻求一个处

① 見本书第219—222頁。——譯者注

于价值之外的价值尺度。他运用了使阿道夫·华格納先生称赞不置的抽象思维能力，以三十页篇幅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乱七八糟地搅和在一起，然后得出结论说：真正的价值尺度是并不存在的，我们必须以一个代用的尺度为满足。劳动可以充当这样的代用的尺度，但是只有在等量劳动的产品总是用等量劳动的产品交换时才是如此，不管“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或者由于采取了措施”才保证是这样。因此，尽管整个第一章都是向我们解释商品“耗费了劳动”、仅仅耗费了劳动，以及为什么，但是价值和劳动仍然是没有任何实际联系的。

而劳动又是不加批判地在它在经济学家们那里通常采取的形式上被接受下来了。不仅如此，洛贝尔图虽然也用两句话提到一下劳动强度的差别，但劳动还是非常一般地当作“耗费的”东西，因而当作度量价值的东西提出来，而不问这个劳动究竟不是在正常的社会平均条件下付出的。生产者为了生产那一天就可以生产出来的产品，是费了十天呢还是只费一天，他们用的工具是最好的呢还是最坏的，他们的劳动时间是费在生产社会必需的产品和社会需要的数量上呢，还是费在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上、或者虽然需要却在数量上比需要的过多或过少，——对于所有这一切，根本不提，却只是说：劳动就是劳动，等量劳动的产品必须同等量劳动的产品交换。在别方面，不管适当不适当，洛贝尔图总还随时准备站在全

国观点上，从社会了望台的高度俯瞰个别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然而在这里，他却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种作法。其所以如此，只因为他从书的第一行起就笔直地驶向劳动货币的乌托邦，而对于劳动就其创造价值的本质进行任何研究，都会在他的航道里投下无法通过的礁石。他的本能，在这里比他的抽象思维能力强得多，——顺便说说，你在洛贝尔图身上发现的抽象思维能力，只是依靠最具体的思想空虚造成的。

现在，过渡到乌托邦的事，在一挥手之间就完成了。为保证按劳动价值进行商品交换成为毫无例外的规则而作的“措施”，没有引起任何困难。具有这个倾向的其他空想家，从格雷到蒲鲁东，都煞费苦心地揣摩过用什么社会制度来实现这个目的。他们至少是设法通过经济途径解决经济问题，通过进行着交换的商品所有者本身来解决问题。洛贝尔图却解决得轻便多了。他作为一个老实的普鲁士人，他请求国家帮忙：国家政权的一道命令就指挥了这个改革。

这样一来，价值是幸运地“构成”了，但构成的决不是洛贝尔图在这个构成上所要求的优先地位。相反，格雷同勃雷以及其他等人早在洛贝尔图以前很久的时候，就反复表示过（而且反复到令人生厌的程度）同样的思想：他们期望有这样一些措施能使产品在任何情况下都总是只依它们的劳动价值相互交换。

国家这样把价值构成之后，——至少是一部分产品的价值，因为洛貝爾圖也是有分寸的，——就发行它的劳动券，預付給工业資本家，工业資本家用它发給工人作工資，工人再用他們得到的劳动券购买产品，于是劳动券又流回它的出发点。它运轉得多美，我們該听听洛貝爾圖本人如何說的：

“至于第二个条件，那么，为了使劳动券上注明的价值真正在流通中存在，必要的措施是只有真正交出一个产品的人才取得一张精确地注明生产那个产品的劳动量的劳动券。誰交出了一个两天劳动的产品，誰就取得一张注明‘两天’的券。只要严格遵守这条規則发券，这第二个条件也就能滿足了。因为照我們的假定，貨物的真正价值总是同生产这貨物时所費的那个劳动量一致的，而这个劳动量的尺度就是普通的時間段落，于是无论誰交出一件費过两天的产品，得到注明两天的券，他得到証明的，不多不少恰恰是他实际交出的价值，——并且，因为**只有真正把一件产品投入流通的人才取得一个这样的証明**，那么，券上注明的价值也就一定存在着，足以滿足社会的要求。不論我們把分工的范围想像得多么广阔，只須严守这条規則，**实际上存在的价格总额必定恰恰等于所注明的价值总额**。可是因为注明的价值总额恰恰等于提交的价值总额，所以后者也必然會与实际存在的价值总额相符，**一切要求都会得到滿足，清算也会正确地进行。**”(第166—167頁)

如果說，到此为止，洛貝爾圖的命运总是不济，他的新发现总是来得太迟，那么，这一次他至少在**一种独創性**上建了功勋：在他的对手中还找不到一个敢于以这样**幼**